

傳統・現代化與知識分子

——金耀基先生訪問記

韋涓



金耀基先生的「從傳統到現代」一書於絕版八年之後，現已再度付梓問世了，在這本書的卷首，有幾句語重心長的「獻詞」，字裏行間處處閃爍出他治學的心懷與淑世的精神，尤其他對中國現代化的殷殷至意，更躍乎文字之上，這個「獻詞」是如是寫着：

獻給

獻身於中國現代化的人

——他們

忠於中國的過去，更
忠於中國的未來。



寫述寶朝陳・情神話談生先基耀金

其實金先生自己，正是在「中國現代化」道路上，一直孜孜矻矻，努力不懈的一個學者。

金先生從臺灣大學法律系畢業，再入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，得碩士學位後，得入美國匹茲堡大學，攻治國際關係與組織學，拿到博士學位，然後在匹大國際關係中心攻讀 post-doctor，專治社會學，於一九七〇年，到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系執教。前年赴英國劍橋大學及MIT訪問研究，並在劍橋大學及德國曼漢大學等發表學術演講。他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院長及社會學系系主任。

我們檢視金先生治學歷程——由法律，而政治學，而社會學——的曲折，可以發現到他一步一步的從深厚學養中，培育出對中國現代化前途樂觀而積極的看法；更由於他在學問上多方的攝取，而能以「科際整合」的方式，對中國近代化的問題，做深入而有意識的研究，在研究中，他是以社會學為基幹的。誠如他自己所強調的：我自己的讀書過程，經歷了許多學科，所以比較能用不同的觀點看問題。尤其落實在「現代化」這麼一個複雜而牽涉多方的問題上，用「科際整合

「的觀點是有其必要的。」

金先生說：現代化所呈現的面貌，是整體性的，所以不能只着重在一個層次或一個面向上去追尋去探究，而社會所關注的，正是對全體性做涵攝的了解；再說，對任何問題一層逼進一層的分析與剖解，逼到了最後，勢必歸結到一個基本的思想架構，而此架構與從事這個研究者的專攻息息攸關，我們可以肯定的是：學者必得以此專攻為主體，以其他學問為輔助，來進行研究工作。

拿金先生的這個看法，與他的自我解說：「我是從一個知識分子的立場，以社會科學上的知識為基底，來探究中國社會文化問題及其前途。」相印證，是有若合符節之處。

那麼，以一個社會學家的觀點，如何使理論與實際相結合？換言之，一個有志獻身中國現代化的學者，應當有如何的貢獻與助益呢？金先生認為臺灣的發展確有突飛猛進之勢，在如此快速的發展中，有許多西方的理論，只能當參考之用，而不能倚之為金科玉律或指導原則，只有通過獨立的思考與經驗研究，來驗證損補一些學科中的概念、理論、通則，才能理解

臺灣現代化的性格與問題，並掌握其普通性與特殊性。

就研究上說，兩個層次必須兼顧：一方面從學理上來探究；一方面着重實際的問題考察，而通過多方面的系統研究與驗證，才能洞悉社會的本質，因為學術思想有時候產生在社會現況之前，有時候理論落在社會現況之後，社會結構愈複雜，愈不容易得到全盤的了解，只作枝枝節節或浮面的研討，將問題簡化的或零碎的描述，是抓不到本質和全貌的。對於臺灣現代化的發展過程，社會科學以及其他的學問，應該加以研究，並有意識的提出見解，使這個現代化可以有更好的發展。

臺灣目前的社會科學研究，經濟學備受重視，無疑的，經濟學確也發生了很大的作用，至於社會學的研究，雖有許多學者專心致力，諸如在社區問題、人口問題、都市問題……上都有不少成績，可惜還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。可以肯定的一點是，在今後多元性的社會發展中，知識愈來愈重要，一切重要舉措，必定要以知識做基礎。學術研究的成果，必能對其他各方面的實際情況，起一定的影響和作用。

有意識的以知識導引社會，是將來一個必然的趨勢。金先生說：十二年前我在「從傳統到現代化」這本書中，提出的一些概念和看法，有些人認為只是象牙塔中的產物，但今天則可以看出當初的理論與現今實際的經驗現象，發生密切的關係，有些甚至已成「普通常識」了。

在臺灣現代化的過程當中，最彰明顯著的就是經濟的發展，「經濟的現代化」的成果是相當驚人的，由於經濟的突出，於是便有「經濟掛帥」這個名詞出現。一般人對經濟遠遠跑到其他各方面的前頭，都引為深憂，但金先生毋寧是抱樂觀態度的。

對今日社會泰半以金錢做為衡量事物的標準這個問題，金先生認為這是有其必然性的。他說：在資本主義或自由經濟下，「市場化」是無可避免，這不只限於經濟領域，也推及到其他領域。而貨幣係一種最有力的交換媒介，正如同許多共產主義的社會，權力成為交換媒介一樣。貨幣與權力都可以成為媒介體，它們本身原不必有好壞，問題出在貨幣或權力的取得、分配與使用的合理性上。在一個複雜而流動的社會中，貨幣居於交換媒介，金錢的多寡無可避免的成為

社會衡量成功的標準。因為貨幣是可以換取其他標價的物品，所以錢愈多便愈易擁有其他的物品，一種輕利的文化，自然看不慣這種現象。

當然，金先生繼續加以闡述說：拜金主義或金錢領導一切常是社會庸俗化、商品化的表徵，然而這不必歸咎於貨幣，問題是一個健全的社會，一切努力與腦力的產品，應該有適如其分的價值，換句話說，亦即應有適如其值的「價格」；譬如一幅好畫，一本好的書，一個好的音樂會，都應該有相當的酬報與認可，而這種酬報與認可，都應該在金錢上有相稱的表徵。金先生相信，經濟發展使得社會力量根源強大，進而就可能刺激藝術、文學與學術等，在文化上能綻放鮮花，結出果實。要知道所謂「精神文明」與所謂「物質文明」是分不開的，真正貧窮的社會是無法享有太高的精神文明，臺灣的現代化已掃除了中國貧、愚、病、弱的老毛病，如果再能有十年二十年的繼續發展，相信我們的物質文明、精神文明都會有更豐富的收穫，而通過有意識的反省與批判，也應該會愈來愈向合理的制度上走。所以，金先生認為，對經濟快速發展所造成的情況，必须要有持平的觀點，不可一味

的只把焦點集中在不合理、不健康之處，看問題要看全貌、看趨向，要採取一個動態的歷史發展的觀點。

此外，金先生覺得臺灣經濟發展的結果，已在政治之外，開闢了一個或無數個新的天地，而出現了社會多元化的現象。中國傳統的士大夫階級，唯一出路便是出仕，在宦途中展佈一己的理想，現在則在政治舞台之外，有經濟上安身立命的地方，能活躍在企業界，大展長才。嚴格地說，傳統的政治，只有行政而無政治，今日選壇中的「政客」，也是新的「角色」。

經濟與政治的關係，金先生也有他的看法。他以爲基本上，經濟發展有助於政治的發展，然而一旦經濟力量過大，則會有造成財閥政治的危險，他以爲政治過於肥腫，或經濟過於肥腫，都非好事，必須有多元的錯綜的交互制衡才能有較健康的局面。他強調的說：經濟或其他制度，成爲政治附庸，固然可悲，但政治若淪爲經濟（特別是少數大資本企業）的附庸，則更可悲。臺灣已出現一個新的經濟，它同時也應該有新的政治。

至於談到臺灣目前的政治與經濟的情形，金先生

說，臺灣是一個海島，決不能孤立，臺灣生存與發展的強度，是與其「世界性」的強度成正比，所以我們不可以有海島性孤立觀念，也不可只與美國或日本一二個國家有關係。而這些關係亦不應只限於政治、經濟，還當擴及文化、藝術各方面去。臺灣社會、文化的多元性發展，將爲中國人提供一個很有吸引力的生活模式。講到這裏，金先生特別強調，今後在文化建設方面，應該有更加勇敢而富想像力的創造。

最後，話題轉到知識分子的問題上去，金先生認爲，在一個「知識性的社會」中，知識越來越重要，而知識的普遍，則將傳統的知識分子的性格與範疇大大地改變與擴張了，今天在政治、經濟、農業、工業……各方面工作的人，都是廣義的知識分子，今日的知識分子不再只是過去的「士」，更不只是「士大夫」（做官的士），過去的「士大夫」在社會中消失了，但大批的新型的知識分子則湧現在社會的各個層面。

今日，不論東、西方，有些「知識分子」發生了嚴重的挫折感，又認爲自己壓迫羣衆，而產生罪孽感。金先生說，知識分子有什麼資格去壓迫羣衆呢？知

識分子根本不構成一階級，因之，更談不上是剝削人的階級，這種「知識分子」的自我詆諆，不過是自虐罷了，而這種自虐，追根究柢，還是來自「衆醉獨醒」的自大狂。挫折感與自虐糾纏在一起，便造成了「知識分子」自我的「反智」，於是傳統的「百無一用是書生」與大陸四人幫的「百無一『是』是書生」，就借屍還魂在自己的身上再現了。什麼是知識分子，金先生認為難以給予一個確切的定義；但什麼不是知識分子，則很容易立論：凡一切「反智」的人必不是知識分子，而知識分子總必須以「愛智」與「重智」為主要心態。

談到知識分子，我們同時也想起金先生的另一本著作「中國現代化與知識分子」，金先生說，他這兩本書，彼此之間有密切的關係，書中透露的精神，也是一脈相承的，集中所寫的文字，所發的議論，在在都着力於臺灣的現況與將來的趨勢上。

這麼多年來，金先生的興趣，一直集中在社會理論、社會發展（包括現代化）上，在香港這些年，他從事了不少理論性與實證的研究，中心點着重在社會

變遷、政治結構與組織理論，他的研究成果，發表在「英國社會學季刊」、「社會與政治季刊」，加大柏克萊的「亞洲調查」及劍橋大學的「現代亞洲研究」等國際性刊物上。

寫了那末多文章，金耀基先生認為自己的發表的言論，並不能免於主觀。他說，學術論文固應力求客觀，但作為一個知識分子，也不能不提出主張，提出看法，這樣主觀性是無可避免的，但一切意見總應出之於知識的真誠，一己的看法當然不代表真理，也不一定是對的，其實沒有一個人可以有這樣的知識上的狂妄，至於在討論社會文化時，尤不可以執着自己的意見為百分之百的正確無誤。他說，每一個人不應該太相信真理是站在自己一邊的，而應該時時擔心自己是否站在真理這一邊。

金先生因拜祭他父親的墓而返國，在臺北炎夏夏日，除了家事、訪友，還參加了幾個學術性的座談會，臨回香港的前一天，匆匆的接受了我們的訪問。在他的身上，確實感受到誠懇與熱情，當然，他對臺灣所抱持的樂觀看法，更讓我們有一分歡喜與盼望。